

朝鮮秋史與清文人學術交流之小考 -以翁方綱與阮元為中心

최창원 (崔昌源)

청운대학교 중국학과 교수 (靑雲大學校 中國學科 教授)

A Study of Korean Kim Jeonghui and Qing Dynasty Scholars Academic Exchanges -Focus on Weng Fanggang and Ruan Yuan-

Chang-Won Cho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Chungwoon University

요약 清朝推翻明朝統治後，對曾為明王朝祖國的朝鮮影響深遠，不僅出現嚴禁攜帶清朝出版各類書籍入關的規定，更有宋時烈“北伐派”提出要北伐清朝的主流政治主張，即使在這樣的背景下，以當時朝鮮半島上洪大容、朴齊家、金正喜等學者為代表，通過多次的訪問順天府(今北京)，提出了“北學中原”的主張，並逐漸形成了朝鮮歷史上著名的實學思想學派“北學派”。朝鮮實學家金正喜更是在與翁方綱、阮元等清朝著名的考據實學學者的影響下，在經學、金石學、書法等上成果丰硕。其所創立的“秋史派”書法風格，雖脫胎於隸書，但更具構圖感，並于非對稱中見和諧，且筆觸蒼勁有力，字字充滿活力，使其成為朝鮮時代金石書法大師。本文從金正喜訪問順天府(今北京)的一些記錄，研究探討當時朝鮮與清朝的學術活動，以及這些活動對朝鮮時期書畫方面的影響。

주제어 : 金正喜, 秋史, 朝鮮時代, 清代, 翁方綱, 阮元, 實事求是

Abstract After the Qing Dynasty overthrow of the Ming dynasty, this is far-reaching influenced on the Ming Dynasty's Sovereign state of the Joseon dynasty. Not only did regulations prohibit the entry into various books published by the Qing Dynasty, In additio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of Song Siyeo put forward the mainstream political proposal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Qing Dynasty. Even in this context, Representatives of scholars such as Hong Daeyong, Bak Jega, Kim Jeonghui on the Joseon dynasty peninsula at the time,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Learning from Central Plains" through several visits to Shuntian Prefecture (now Beijing), And gradually formed the well-known Silhak (Practical Learning) ideological of "Bukhak, (Northern Learning)" in the Joseon dynasty history. the Joseon dynasty Silhak ideological scholar of Kim Jeonghui also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eng Fanggang and Ruan yuan other famous Qing Dynasty Textual scholar,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Classical Studies Epigraphy, Calligraphy. He founded the "Chusa-che" style of calligraphy Chusa, the "Chusa-che" styled is although born out of the clerical script, but more composition and See also asymmetrical in harmony, Strong and vigorous brush strokes, Every word vibrant, Make it a master of gold stone calligraphy in the Joseon Dynasty. This study based on some records of Kim Jeonghui 's visited to Shuntian Prefecture (now Beijing),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of seeking truth to facts in Korea and the Qing Dynasty at the time, and the impact on these activities o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in the Joseon Dynasty.

Key Words : Kim Jeonghui, Chusa-che, Joseon Dynasty, Qing Dynasty, Weng Fanggang, Ruan Yuan,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Received 17 December 2019, Revised 02 January 2020

Accepted 10 January 2020

Corresponding Author: Chang-Won Choi

(Chungwoon University)

Email: cwchoi@chungwoo

ISSN: 2466-1139

© Industrial Promotion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is an open-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Non-Commerci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3.0>),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non-commercial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1. 序論

朝鮮李氏王朝視中國明朝為宗主國，在清軍入關推翻明王朝後，“改正朔、易服色”。這對那一時期的朝鮮知識階層打擊較大，有的知識分子認為中原的儒家文化已經滅亡，“中原”已是“夷狄之邦”，有的則認為清朝立國只是暫時的，“胡兒無百年之運”，不久便會衰敗。這種對清王朝抵觸情緒蔓延擴大，急於與清朝劃清界限，且嚴禁從清朝帶來的各類書籍入境。朝鮮正祖十一年(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朝鮮備邊司規定“挾帶雜文書及我國書冊者。杖一百，流三千里”¹⁾、“凡係書籍，涉於左道，不經異端妖誕之說及雜術方書，一切嚴防。毋論譯官及三使臣所屬，如有潛質之事，即其地摘發，燒火狀聞。”²⁾等等，對於該如何處理與清王朝的關係，各方雖議論紛紛，但當時宋時烈³⁾為代表的以“尊明攘夷”、“北伐清朝”的“北伐派”為主流主張⁴⁾。

當時的大環境雖以消極抵觸甚至帶有敵意的態度為主流，但是康雍乾盛世的學術文化成就，還是被人看在眼里，以洪大容⁵⁾、朴齊家⁶⁾、朴趾源⁷⁾、金正喜等為代表的著名學者，經過各種途徑入訪清朝順天府（今北京），通過實地考察清朝的統治和日常的社會生活及學術文化等活動；以及與乾嘉學者翁方綱、阮元、孫星衍⁸⁾

等學者加深往來，更是認識到了清王朝的開明實學之處，提出了“北學中原”的主張，這才逐漸地將朝鮮時代李朝人由崇明排清的正統主義立場，漸漸轉變為學習清朝學術成就的風氣。當時的朝鮮曾派出了無數遠赴清廷進貢的人士，而隨行的貴族士大夫們自然成為了中韓學術交流、交織的樞紐和中心。隨著這些往來的頻繁，朝鮮時代受到清朝的積極影響，實學思想逐漸流傳起來。較有代表性的有十八世紀前半期以星湖李瀾⁹⁾為代表的“經世致用派”，此派注重在土地、行政等制度方面的改革；而十八世紀後半期朴趾源則是“利用厚生派”，主要以工商業、生產方面的改革為目標；還有就是十九世紀前半期(相當於清嘉慶時期)以金正喜(1786年-1856年)為代表的“實事求是派”，其主要以考証經典、金石、文藝、書畫等的活動。當時這些朝鮮王朝與清朝的學術交流活動，不僅促使朝鮮時期實學思想的產生，並且是朝鮮時期文藝復興式發展的重要萌芽。而以秋史為代表的學者在這段時期的學術交流活動，對韓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本文通過對秋史先生訪問清順天府（今北京）時期的一些歷史記載，以及訪問以後與翁方綱、阮元等的書信往來，來研究整理兩國學者之間的主要學術方面的交流活動，以及學術交流的一些重要成果，以此在中韓學者交流史中的進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2. 秋史的中国情结

2.1 秋史其人

金正喜，慶州金氏的子孫，字元春，號秋史，又號阮堂、禮堂、詩庵、覃研齋等。公元1786年6月3日出生於今韓國忠清南道禮山郡龍宮里，卒於朝鮮哲宗七年(1856年)，終年71歲。其出身於兩班¹⁰⁾貴族家庭，其父為戶曹

法家、經學家。字淵如，號伯淵，別署芳茂山人、微隱。陽湖（今江蘇武進）人，後遷居金陵。少年時與楊芳燦、洪亮吉、黃景仁以文學見長，袁枚稱他為“天下奇才”。

- 9) 李瀾（公元1681～1763年）是朝鮮王朝後期的文臣，實學者兼性理學者，經濟理論家。字自新，號星湖，朝鮮實學“星湖派”（“經學派”）的代表人物。
- 10) 兩班（韓語：양반，英文音譯：Yangban）是古代高麗和朝鮮的貴族階級。“兩班”一詞指上朝時，君王坐北向南，以君王為中心，文官排列在東邊，武官排列在西邊，即“文武兩班”，之後，兩班專指上朝會的官員延伸到兩班官員的家族及家門。古代朝鮮對貴族或官員的尊稱也是“兩班尼”（양반님，相當於漢語的“大人”）

1) 《備邊司謄錄》朝鮮正祖十一年丁未十月初五日。

2) 《朝鮮王朝實錄》第45冊，頁673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va_11110010_001

3) 宋時烈（公元1607～1689年）初名聖賚，字英甫，號尤岩、華陽洞主、橋山老夫、南澗老叟、諡号文正。是朝鮮王朝的儒學者、政治人、思想家、作家。朝鮮孝宗、肅宗時期的重臣。朝鮮王朝後期的反清夏明思想家的巨頭一人，東國十八賢的一人。他是朝鮮王朝中期的大儒學者及西人黨首、老論黨的首任黨首。後世朝鮮人有稱宋子、宋夫子。

4) 文炳賢《朝鮮時代的韓國以及清儒學術交流-以阮堂金正喜為主》，《船山學刊》，2011，第1期。

5) 洪大容（公元1731～1783年）字德保，號湛軒，朝鮮漢城人。朝鮮李朝的哲學家、自然科學家，實學派北學論的主要代表。出身兩班即士族地主階級，任過世孫瑊衛司侍直、秦仁縣監、榮川郡守等職。他的哲學思想，對朝鮮唯物主義哲學的發展有重要影響。

6) 朴齊家（公元1750～1805年），字修其，又字次修、在先，號檢書，亦號楚亭、貞葵，朝鮮漢城（今韓國首爾）人。清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初五日生，嘉慶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卒。是十八世紀朝鮮思想史上空前絕後、構築了獨特思想体系的的思想家，代表十八世紀後半葉的卓越詩人，標誌朝鮮後期小品風格的重要散文家，文人畫家和書法家，朝鮮“詩文四大家”之一。

7) 朴趾源（公元1737～1805年），韓國李朝末期學者、詩人、小說家，“北學派”代表人物。字仲美，號燕岩。曾隨堂兄朴明源率領的使團到中國祝賀乾隆70歲生日，游歷了北京和承德，主張實學派，對文學發展起了較大貢獻，1805年12月10日病逝於漢城。

8) 孫星衍（公元1753～1818年），是清代著名藏書家、目錄學家、書

判書¹¹⁾金魯敬(号酉堂),其在“面牆五經,挂壁三史”(《辭奎章閣待教疏》《阮堂先生全集》卷二)的家族環境下,天資聰慧,在他七歲時,朝鮮正祖時期的宰相蔡濟恭路過金正喜家的大門時,看到了“立春貼”上的字迹大為感嘆。18世紀后期著名的實學家朴齊家看到他的字迹后,就決定要收這個孩子為自己的門下,在8年以後,他拜于游英正實學巨匠朴齊家之門。金正喜精通經學、史學、詩文、金石、書畫等,是李朝純祖時著名的經學家、書畫家。其成就不僅為時人所贊譽,更為後世所敬仰。

金正喜拜于朴齊家門下期間,受其師北學思想影響,曾听其老師親自講起三訪順天府(今北京)的經歷,便對訪問順天府(今北京)的儒者名流的經歷向往不已。在這些講述中他充分的感到了清朝經世實學和較發達的科技文物,熱切地盼望有朝一日能夠親自去順天府(今北京)親身感受這一切。終於,在公元1809年10月(嘉慶十四年),剛剛科舉及第的金正喜終於隨其父(時任冬至兼謝恩副使吏曹判書)來到了夢寐以求的順天府(今北京)。之前金正喜就曾通過朴齊家、柳惠鳳等人得知了清朝的鴻儒翁方綱、阮元等人的大名,于是在其來到順天府後,便迫不急待地拜訪這些鴻儒碩士,并向他們請教學問。據《阮堂金公小傳》記載:“判書公(魯敬)使于燕,公(正喜)隨而入,時年二十四,阮閣老元、翁鴻臚方綱,皆當世鴻儒大名,震海內外,且顯不輕與人接,一見公莫逆也。(《阮堂先生全集》)。而這段經歷正是其成就的重要淵源。金正喜是極其幸運的,當時曾與朴齊家、柳惠鳳等人有交集的不少名儒學士或早已離開人世,或已上山修道,亦或南下不在京城。所幸當時翁方綱、阮元、曹江等人還留在京城中。這才使金正喜有幸與諸位大儒一見,了却其一樁心願。

回到朝鮮以後,他根據在清朝所積累的深厚學識,在31歲時就指出,北漢山上原本被認為是“無學大師碑”的碑文,經其考証,應為新羅真興王的巡狩碑。他也因此躋身為金石學界大學者的行列。而且他在經學、佛教、詩

文、繪畫等方面研究與造詣,令其成為19世紀東北亞的著名學者。他的仕途也很順利,38歲時任奎章閣待教,41歲時任忠清右道參議,51歲任職兵曹參判,54歲任刑曹參判一年後的6月任冬至副使¹²⁾。然而,隨着在官場上的步步高升,金正喜却逐漸卷入了當時朝鮮王朝高層間的黨派之爭,並因“尹尚度獄”於1840年被流配到離濟州島80里處的大靜縣¹³⁾,而此次發配竟長達9年。朝鮮王朝時期流配之刑為防止犯人脫逃,受刑之被看守于布滿荊棘的圍牆內。金正喜為了克服流配之地的孤寂,不斷地創作,以至於他磨穿了10個硯台,寫廢了上千杆筆。最終,他終於達到了“字即為詩,詩即為畫”的至高境界,他在紙上繪出一座房子和一棵枯樹,題為《歲寒圖》¹⁴⁾,其用枯筆技法表達了其內心世界的高尚情操,而這種節制與省略是對人為記述與虛偽的一種反駁,代表了文人畫的獨特性質,他所創的為世人所熟知的“秋史體”就在這樣的孤寂的環境中產生,而文人畫《歲寒圖》更是其人生中極其代表性的輝煌藝術作品。此時期金正喜的所寫所畫,其實都是他的淚與汗水,也是其的“靈魂”之所在。他不僅為世人留下“秋史體”和《歲寒圖》,還在詩與散文中里留下了自己的獨到見解。1849年,他雖然結束了流配生活,但却在兩年後再次遭到流配。最後,他在京畿道果川度過晚年,並於1856年與世長辭,享年71。

金正喜先生一生成就頗多,他不僅精通書畫,更是著名的經學家、史學家、金石學家、考証學家,還是一位創作成果豐厚的詩人,可惜其書名太高,其詩名往往為其書名所掩¹⁵⁾。正如朝鮮王朝學者申錫禧(1808-1873)《覃孳齋詩集序》所云:“阮堂公詩文,故卓然大家,以工書名天下,為其所拚云。余少日借讀公詩。始信公之可傳者,不第以書名。”秋史先生為後人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書畫藝術及文學、學術遺產。

11) 朝鮮王朝時期,戶曹的本曹設置官員五十四名,分別為判書一名(正二品)、參判一名(從二品)、參議一名(正三品)、正郎三名(正五品)、銓郎三名(正六品)、算學教授一名(正六品)、別提二名(正六品)、算士一名(正七品)、計士二名(正八品)、算學訓導一名(正九品)、會士二名(從九品)。戶曹下設版籍司、會計司、經費司三個機構。

12) Kim Sang-tae, 秋史金正喜樂汕居人石澗人과의 關係研究, 國立大學圖書館報, 第18輯, p8.

13) 為今韓國濟州島南濟州郡大靜邑。

14) 《歲寒圖》



15) 詹杭倫, 論朝鮮王朝學者金正喜的詩學宗尚, 中山大學學報, 2017年5期, 第57卷, p37.

2.2 秋史臨京

金正喜的老師實學家朴齊家先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作為出使清朝的使臣隨員,到訪了順天府(今北京),結交了紀曉嵐在內的很多清朝文人朋友。訪問順天府期間受到熱情款待,而朴齊家更作為朝鮮詩人的代表,受到了清代著名學者紀曉嵐、李調元、潘庭筠等人的稱贊。并與紀曉嵐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朴齊家回到朝鮮後將在順天府時探訪的文物制度等,整理成書為《北學議》。朴齊家曾四次出使清朝與紀曉嵐、翁方綱、阮元等近100多為清朝人士結交相識。金正喜正是在這位“北學派”巨頭的教導和影響下,繼承了洪大容、朴趾源“吸收外物而善己”思想的“北學”脈系。

在其師朴齊家的影響下,金正喜對順天府充滿了憧憬。終於在24歲考取了科學生員以後,隨其父親一同出使清朝。他到了順天府之後,結識了諸多文人學者,并拜其中兩位敬仰已久的學者為終身之師,一位是翁方綱,另一位便是阮元。而後金正喜更是以阮元弟子自稱,并以此意自号阮堂。阮元與朴齊家熟識,更對朴齊家的這位門生喜愛有加,阮元送給金正喜245本書。其中包括阮元寫的一本《北碑南帖論》,這本書金正喜一生珍藏,在 김정喜所著的書籍里也表達了對阮元尊敬的心情。翁方綱對於金正喜也非常贊賞,給他看自己的藏書,寫了很多作品送給他,金正喜從中受到很多啟發。當金正喜要離開中國的時候,阮元、翁方綱等一行八人為他送別,同行的朱鶴年畫下了《秋史餞別圖》¹⁶⁾,這幅畫被金正喜帶回了朝鮮妥善珍藏。

金正喜訪京的這段經歷,對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在翁方綱的教導下,將學問與書藝貫通一體,通達了碑文的書體研究,發現了清代學者以藝術性為觀點而進行的碑學運動,并以此開拓眼界、融會新旧思潮,將考證學、金石學、歷史學轉化為多元的藝術書風,這更是深刻地影響到了日後朝鮮書法的發展與創新。中國從晚明

時就形成了一種浪漫主義的書風,出現了一批頗具革命性書風的思潮,特別是以“揚州八怪”為代表的書風在國內形成了一股潮流,而此時的朝鮮書壇還是在研習董其昌¹⁷⁾的風格。金正喜在順天府(今北京)期間,發現了清朝浪漫主義書風的態勢,并受到了極大的啟發。

金正喜返回朝鮮後,幾十年間一直與清朝一大批文人保持了非常密切和頻繁的交流,雙方互贈禮品極多。清學者們不僅通過金正喜了解了諸多的朝鮮的拓片、石碑,獲得了更多的治學文獻、拓寬了研究的領域。同時也讓朝鮮時期的學者看到真正作為書法母國的豐富資源。這與他將來“秋史體”的形成,包括書風在韓國迅速流行是密切相關的。金正喜的“秋史體”書法始於隸書,初期仿顏真卿和董其昌,但自清朝回國後,精研歐陽詢、翁方綱、阮元諸家,最終創出了格調高古的“秋史體”,其在隸書、行書方面達到了新的境界。由於他一反獨尊趙孟頫傳統書風的風格,大膽創新,而被朝鮮書法界譽為“書聖”、“朝鮮書法史上的最高精華”。因此,金正喜不僅成為了當時朝鮮研究清朝書學的第一人,也成為了朝鮮書法巔峰的代表人物。在 김정喜這40天的京城之行,所見所識都全方位的影響了他的思想、審美、創作。回到朝鮮以後,在他的努力下,以金石考證學為中心的清朝學術傳入朝鮮,并在當地得到了繼承和發展,還對現當代韓國的書畫藝術產生了極其深遠地影響。

3. 秋史與翁方綱、阮元的交集

3.1 秋史與清朝大儒的往來

清代“乾嘉之學”是清朝康、雍、乾、嘉時期清儒的偉大學風,那時的清學者們提倡做學問一方面要考究文獻、講求章句,更要道德踐履、經世致用。不在提倡單一的文獻學習,認為考求古典只是工具,更重要的是修齊治平。但是,由於清初文字獄盛行,學者不敢知行合一,胸懷天下,而是被壓抑於方寸間的書齋中。隨著乾隆時期廢除文字獄,到後來嘉慶時期對外交流逐漸的增多,更多學者又開始注重實際,聯系現實政治。這便產生了一大批通儒式的學者,他們精於文獻考據,同時也

16) 《秋史餞別圖》



17) 董其昌 (1555年2月10日—1636年10月26日),字玄宰,号思白、思翁,别号香光居士,直隶華亭縣(今上海松江區)人。明朝政治人物,書畫藝術家。万曆己丑進士,官至南京礼部尚書。与邢侗、張瑞圖、米万鍾合称晚明四家。

關注世道人心。金正喜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來到順天府（今北京）。這期間，他不僅搜集了大量經、史、書、畫等資料，且結識了嘉慶時期諸多名儒學者，更是得到敬仰已久的翁方綱和阮元的器重，成為座下弟子。金正喜回國后一生所用字号甚多，但大都可從他翁方綱、阮元兩位中國老師身上尋找到淵源。如金正喜一号“阮堂”。乃是表達對阮元的敬重，而其号“詩庵”。則為翁方綱所賜。其又号為“礼堂”，則是表達對清代中期禮學大家凌廷堪的敬仰。由此可見其与翁、阮等交誼之深及對清代學術的向往。

金正喜初訪時清朝雖相識諸多大家。但后来金正喜最常称頌的却是“翁、阮”兩位導師。李尚迪《恩誦堂集》中《奉挽秋史金侍郎》說：“海國通儒(阮堂)旧見，推北翁覃溪，南阮芸台。”一位是漢學考据的大師和學術領袖，另一位是服膺宋儒兼通詩書畫的大儒。翁、阮二人無疑是金正喜能够會通漢宋，終有所成的重要導師。

翁方綱（1733年-1818年），字忠叙，一字覃谿，号覃溪，晚年号蘇齋。順天府大興縣（今屬北京市）人，清代書法家、文學家、金石學家。乾隆十七年（1752年）壬申恩科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任國子監司業、內閣學士等，后出督廣東、江西學政¹⁸。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辛亥九月十七日，提督山東學政。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六月二十三日，奉旨回京供職¹⁹。嘉慶四年（1799年），左遷鴻臚寺卿。嘉慶十二年（1807年），重赴鹿鳴宴，獲賜三品銜。嘉慶十九年（1814年），再赴恩榮宴，加二品銜，其時年已八十二歲。后于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与世長辭。

翁方綱精于經史考据之學，亦注重文學，曾作《書經》、《禮經》、《論語》、《孟子》等書的筆記。精通金石、書畫。著有《兩漢金石記》、《粵東金石略》、《漢石經殘字考》、《焦山鼎銘考》、《廟堂碑唐本存字》、《夏初堂集》、《石洲詩話》等²⁰。在詩

歌方面，他以杜甫、黃庭堅、蘇東坡為正統。后代總結他的詩學理想為“肌理說”。此說言辭藻与內涵、技巧及心意之結合。且其書畫之學亦有詩學色彩。更難能可貴的是，翁方綱治學不强分漢學、宋學門戶，他不排斥義理之學。公元1809年冬，金正喜在順天府保安寺街見到了翁方綱。翁方綱許其成為弟子，后来又賜号“詩庵”。金正喜在畫蘭時常用此号。在翁方綱這位老師這里，最吸引金正喜的可能不是“經典”上的訓詁考据，却是更偏重于金石、書畫的方面的藝術造詣。他從翁方綱學到了比李朝文人更加丰富且奇妙的筆墨法度及藝術构思。翁方綱所收藏的大量書畫作品，另金正喜大開眼界。

阮元（1764年-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別号雷塘庵主，晚号頤性老人，占籍儀征，實為邗江公道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歷山東、浙江學政，遷兵、禮、戶三部侍郎。嘉慶時，先后任浙江、江西、河南巡撫，漕運、湖廣、兩廣總督。道光時，遷云貴總督，隨后入朝拜体仁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進太傅，卒諡号文達²¹。

阮元是清代中后期号称“三朝(乾隆、嘉慶、道光)元老”的封疆大吏，同時又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大師鴻儒，在經學、史學、哲學、訓詁、文字、金石、書畫、校勘、歷算、輿地、文學等領域都卓有建樹。他從文五十年，隨位高權重，但不廢學問，宏著頗丰，著有《經籍纂詁》、《皇清經解》、《疇人傳》、《擘經室集》等三千六百多卷，尤以訓詁、考据之學見長，成為乾嘉學派的后起之秀和揚州學派的中堅人物。嘉慶十四年（1809）十月二十八日，金正喜隨其父來訪順天府。阮元非常熱情地接待了他，以上等“胜雪”茶為款待，共賞了金石圖書，贈予其《經籍纂詁》。金正喜的《仿怀人詩体歷叙旧聞，轉寄和舫大板浪華間諸名胜当有知之者十首》中：“《七經》与《孟子》，《考文》析縷細。昔見阮夫子，嘖嘖嘆精詣。隨月樓中本，翻雕行之世。”也講述了与阮元見面時的情形。嘉慶十五年（1810年），阮元与李鼎元、洪占銓、譚光祥、劉華東、翁樹昆、金勇、李林松、朱鶴年等人為金正喜踐行。此后，金正喜還因在順天府期

18) 《翁氏年譜》記“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辛亥九月十七日，奉命提督山東學政。”

19) 《翁氏年譜》記“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六月二十三日，奉旨回京供職。七月二十四日，回京。七月二十五日，到內閣辦事。”

20) 《清史稿·卷485》：方綱精研經術，嘗謂考訂之學，以衷于義理為主，論語曰“多聞”、曰“闕疑”、曰“慎言”，三者備而考訂之道盡。時錢載斥戴震為破碎大道，方綱謂：“詰訓名物，豈可目為破碎？考訂訓詁，然后能講義理也；然震謂聖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則不盡然。”方綱讀群經，有書、禮、論語、孟子附記，并為經義考

補正。尤精金石之學，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參以說文、正義，考証至精。所為詩，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其中。論者謂能以學為詩。他著有《夏初齋全集》及《禮經目次》、《蘇詩補注》等。

21) 阮元文化网, <http://www.rywh.net/view.asp?id=2>

間未能與諸公以詩會友而深感遺憾，寫下了《我入京與諸公相交，未曾以詩訂契，臨歸，不禁悵觸，漫筆口占》一詩：“我生九夷真可鄙，多愧結交中原土。樓前紅日夢里明，蘇齋門下瓣香呈。後五百年唯是日，閱千萬人見先生。芸台宛是畫中睹，經籍之海金石府。土華不蝕貞觀銅，腰間小碑千年古。化度始自壁蚌齋，攀覃緣阮并作梯。君是碧海掣鯨手，我有靈心通點犀。野云墨妙天下聞，句竹圖曾海外見。況夏古人如明月，却從先生指端現。翁家兄弟聯雙璧，一生難遣愛錢癖。靈芝有本體有源，爾雅迭宕高一格。最恰劉伶作酒頌，徐邈聊夏時一中。名家子弟曹玉水，秋水為神玉為髓。覃門高足劇清真，落筆長歌句有神。却憶當初相逢日，但知有逢不有別。我今旋踵即萬里，地角天涯在一室。生憎化兒弄狡獪，人每喜圓輒示缺。烟雲過眼雪留爪，中有一段不磨滅。龍腦須引孔雀尾，琵琶相應奏寶鐵。黯然銷魂別而已，鴨綠江水中渴。”

3.2 秋史歸國後的交流

金正喜回到朝鮮後，也還一直挂念著翁方綱和阮元，不僅互通書信，互道近況、探討學術問題，並在學術方面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嘉慶二十年（1815年），十月十一日，翁方綱致信金正喜，告知其四兒翁樹崐凶耗。十四日，致信金正喜論治經要義，曰“省手札，具叩諸經義，蓋意在欲治《儀禮》，甚善。所說鄭注未剖處，此須通徹詳之”²²⁾。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正月二十五，翁方綱再次致信金正喜，與其討論考証之學，認為“考訂之學，漢學也；義理之學，宋學業。”勸解金正喜，曰：“考証即義理止血，不分二事，切勿空談，好學深思”。次年（1817年）已經八十四歲高齡的翁方綱致信金正喜，信中說“諸經《附記》自去年秋間以來，覆家檢核”，“承札問朱子《易本義》音訓，訓詁之學與義理之學，本是一理，無所庸其歧視也。”為金正喜對“《易本義》音訓”問題的進行了答復。隨著二人書信的往來，相互也會互贈禮物，翁方綱將自己的文集、著說、刊印本贈予金正喜，金正喜也將朝鮮文人的文集、石刻碑帖、古鏡、紙張等物品贈予翁方綱²³⁾。

道光三年（1823年），阮元的《學經室集》刊刻後不

久，金正喜便得到此書。在認真拜讀以後，獲悉了元代朱世杰的《算學啓蒙》在中土已經失秩，便在朝鮮竭盡全力搜求到了《算學啓蒙》的原刊本並加以重刻，使得《算學啓蒙》得而復失。道光十一年（1831年）金正喜弟子李尚迪到訪中國，次年回國之際，當時在順天府的阮元之子阮常生，委託李尚迪將阮元主持編纂的多達1400卷的巨著《皇清經解》轉贈給金正喜，此乃傳入朝鮮的首部《皇清經解》²⁴⁾。

金正喜的書齋別名之一為“覃學齋”，乃取翁方綱之別號“覃溪”和阮元之書齋別名“學經室”（又名“學經齋”）中各一字組合而成，可見金正喜對這兩位學者的尊敬。更是處處顯現出金正喜與這兩位大儒的跨越國境的非凡友誼。

4. 翁方綱與阮元對秋史治學方面的影響

翁方綱與阮元作為金正喜一生中極其重要的導師，兩位的治學精神各有不同，這也對金正喜產生了不同的影響。翁方綱初次見到金正喜感嘆道“海東有此英才耶！”，並盛贊秋史“經術文章，海東第一”。更不惜將其珍藏的史料和金石碑帖贈予這位天才學子。後來，金正喜拜於翁門下，翁方綱又展示了其秘藏書畫名品，圖畫真迹，並從鑒賞到考証傳授給金正喜。金正喜在後來的回憶中曰：“圖書文籍，扞架琳琅，登其堂者，如入萬花谷中，令人心搖目眩，而無暇譚論者也”。翁方綱為人忠厚敦古，充滿著理想主義精神，他的書畫的收藏和傳授對金正喜今後的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而阮元對其的影響則表現其治學理念上，年僅47歲的阮元當時已是名滿京城的大學問家和政治家。他不僅培養了大批學者，還刊印了諸多流芳千古的經典，如《十三經注疏》、《學海堂經解》等。阮元在在做學問上，雖然表面上看似繼承了戴震的觀點，即以訓詁考據來研究古代經典，但他有著博大的胸襟，他的弟子、門生、幕僚等很多都並非純粹漢學考據的路子。阮元認為：“聖人之道，譬若宮墻，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²⁵⁾ 阮元在學問上不完全拘泥於漢學考據，

22) 《夏初齋文集》卷十一《答問秋史》

23) 黃麗華，2014，《金正喜與翁方綱的交往小考》，延邊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p157.

24) 陳東輝，2006，阮元在中朝關係史上的若干事跡考述，湖南大學學報，第20卷第2期，p44

更像是為有号召力的學術組織者。阮元強調的“實事求是”、富于批判的現實主義精神，對金正喜的學術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金正喜在回到朝鮮後也積極倡導金石考據學，並成為了該領域取得重大成果的朝鮮金石學第一人，是名副其實的朝鮮金石學開創者。與阮元的見解一樣，金正喜也認為金石考據之目的在於“羽翼經史”、“分隸同異，偏旁流變”²⁵⁾。金正喜在阮元的“宮墻”、“門徑”之喻的基礎上，提出了“聖人之道，譬若甲第大宅”，“訓古者門徑”之說（《全集》卷1，《實事求是說》）。在他看來聖賢之道好比甲第大宅主所居住的“堂室”，而訓話又好比是“門徑”。“堂室非門徑不能人也”，若“門徑不誤堂室”，“必精訓話”。很顯然，金正喜的“堂室”與“門徑”之說是對阮元的“宮墻”與“門徑”之論的繼承和發展。金正喜還提到“不尚空論”和“躬行實踐”的問題，為的是堅持“精求訓法”的考據實踐。金正喜的求是學風對他的金石書法的成就有很大的幫助，特別是金正喜在對《新羅真興王巡狩碑》和《真興王巡狩碑》這兩個碑文進行考證時，充分利用了金石學知識，不僅考據出碑的性質、年代，還發現了文獻誤記的問題，其所撰的《真興二碑考》一文做出了出色的考證，視為朝鮮金石考據學的重要代表作品。

金正喜晚年流放濟州島，在自畫像上自題說：“覃溪云‘嗜古經’，芸台云‘不肯人云亦云’，兩公之言，盡吾平生，胡為乎海天一笠，忽似元佑罪人”他自比中國宋朝元佑年間因為“烏台詩案”獲罪的蘇東坡，遙想兩位老師的話，思考他一生的學問方向。後來阮堂沖破古人樊籬終於領會出獨具一格的“秋史體”書法。應該就是在對翁、阮二老師思想軌迹苦苦冥想尋覓的成果。

5. 结论

金正喜在翁方綱、阮元的金石學研究和實事求是的治學方法的影響下，在金石、書法上取得了卓越的歷史成就，並且推動了海東金石書法的發展。雖說金正喜在學術方面同時受到阮元、翁方綱清學者的影響。但是，其

25) 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A]，阮元，學經室集-一集：卷二[C]，北京：中華書局，1993，p37

26) 金正喜，與申威堂三[A]；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二[C]，漢城：新誠文化社，1972

實學思想則更主要源於阮元。金正喜秉承其的治學理念，著有《實事求是說》，更是強調了影響秋史的此理念。而阮元也對金正喜這位異國晚輩學者盛贊有加，稱其為“海東第一通儒”，評價頗高。當然，翁方綱也在其書法造詣上幫助極多，影響深遠。而秋史與清代學者們的交流，確實有力地推動了兩國間的文化、文學、書畫、學術等等的諸多發展，並在中韓兩國文化交流中有着極其重要的地位。

首先從朝鮮文壇的發展角度來看，在朝鮮時代之所以能夠形成以金正喜為中心的考據派（實學派之一）無疑是受到了翁方綱、阮元等清代大儒的影響。翁方綱、阮元等在金石學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也為朝鮮時代的學者們提供更有價值的學術參考資料，從而促進了其相關學術體系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這為後世兩國共同研究相關的文化遺產提供了積極的榜樣。

其次，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朝鮮時期實學派的興起，是金正喜這樣極具代表性的使者增強了與清朝交流的結果，這對當時朝鮮的社會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還有，秋史的門生中，李尙迪（号藕船）最為博學多才，出使入清朝達十二次之多，也是交往了當時諸多的清大儒。秋史於道光二十年被流配到濟州島，李尙迪在老師謫居之時，常寄書籍以慰其寂寥，秋史感其情誼，自畫《歲寒圖》贈送給李尙迪。李尙迪到訪順天府時隨身攜帶此圖，見此圖者皆懷想秋史之風。可見秋史在中韓學術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金正喜與這兩位清代大儒的深入交流，所迸發出的火花，為兩國增添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同時也看到了朝鮮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融合和發展。中韓兩國同屬漢字文化圈，中韓兩國人緣相親，文脈相通，有着同源相通的文化傳統，更為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References

- [1] 《清史稿·卷485》
- [2] 《翁氏年譜》
- [3] 《備邊司瞻象》朝鮮正祖十一年丁未十月初五日
- [4] 《朝鮮王朝實錄》第45冊，頁673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va_11110010_001
- [5] 文炳贊，《朝鮮時代的韓國以及清儒學術交流-以阮堂

- 金正喜爲主》，船山學刊，第1期，2011.
- [6] 詹杭倫，《論朝鮮王朝學者金正喜的詩學宗尚》，中山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第57卷，2017.
- [7] Kim Sang-tae, 《秋史金正喜와 樂汕居人 石澗人과의 關係研究》，國立大學圖書館報，第18輯
- [8]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 卷九》，漢城：新誠文化社，1972.
- [9] 葛榮晉主編，《韓國實學思想史》，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 [10]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六》。漢城：新誠文化社，1972.
- [11] 閔奎鎬，《阮堂金公小傳》[A]。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首，漢城：新誠文化社，1972.
- [12] 黃麗華，《金正喜與翁方綱的交往小考》，延邊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2014.
- [13] 金正喜，《實事求是說》，《阮堂先生全集：卷一》，漢城：新誠文化社，1972.
- [14] 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A]，阮元·軍經室集—集：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93.
- [15] 阮元，《國朝漢學師承記序》[A]。《覃經室集·一集：卷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93
- [16] 金正喜。《雜識》[A]，《阮堂先生全集》：卷A。漢城：新誠文化社，1972.
- [17] 阮元。《金石十事記》[A]，《擎經室集·三集：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93.
- [18] 陳東輝，《阮元在中朝關係史上的若干事考述》，湖南大學學報，第20卷第2期，2006
- [19] 金正喜，《與申威堂三》[A]。《阮堂先生全集》：卷二。漢城：新誠文化社，1972.
- [20] 金正喜，《真興二碑考》[A]。《阮堂先生全集》：卷六。漢城：新誠文化社，1972.
- [21] 李元淳。《燕京琉璃厂市與朝鮮學人》，黃時鑒主編。韓國傳統文化·歷史卷。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195-214.
- [22] 詹杭倫，《論朝鮮王朝學者金正喜的詩學宗尚》，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7年第5期
- [23] 金翊煥編：活字本《阮堂全集》，首爾民主文化推進會 1934年發行，本文引用金正喜詩文都根據此本。
- [24] 陳康祺，《郎潛紀聞》，中華書局 1984年版。
- [25] 文炳贊，《朝鮮時代髓韓國以及清儒學市交流-以阮堂金正喜爲主》，南京大學文學院，2011年第1期 (夏總

第79期)， 2011

- [26] 阮元文化網, <http://www.rywh.net/view.asp?id=2>
www.baidu.co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

崔昌源(Choi, Chang-Won)



- 1998-2019년 : 청운대학교 중국학과 교수 겸 중국예술문화연구소소장
- 2013년 : 중국내몽고사범대학교홍익대학 부총장
- 2000년 : 중국 북경공업대학 방문 교수
- 2013년 : 중국 북경대학 및 천진공업대학 방문교수
- 2000년-현재 : 중국내이명구사범대학교 석사학위지도 교수
- 관심분야 : 중국문화학
- E-Mail : cwchoi@chungwoon.ac.kr